

丁格尔眼中的袁世凯

汤伏祥

在辛亥革命期间，曾有不少外国记者积极参与其中，他们站在相对“中立”和“超脱”的立场上，审视这段历史，报道这一历史事件，评说其中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参考。丁格尔就是其中的一位。

丁格尔何许人也？

丁格尔，他的英文名为：Edwin · John · Dingle，即埃德温·约翰·丁格尔，丁乐梅是他的中文名，英国传教士，1884年来到中国。他长期在中国传教，熟悉中国社会，写了不少文章，将中国国内的情况介绍给西方世界，其中包括《徒步穿越中国》、《我在西藏的生活》等。同时，他也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旅行家。辛亥革命爆发时，丁格尔正住在汉口，亲眼目睹这一

事件的整个过程。作为英文《大陆报》特派员的他，有机会广泛接触了交战双方的高层人物，其中与黎元洪的交往甚为密切，并对黎元洪多加赞赏，称黎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正是由于这些，他对辛亥革命这一事件以及当事人，都有着独到的见解。自然，对袁世凯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评说。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重新起用了袁世凯，而袁世凯则借助自己手上的兵



清军的情报人员在执行任务

权，一直在观望革命的发展态势。黎元洪知道袁世凯的政治意图，希望袁世凯能有一个合理的态度，竭力劝说袁世凯转向革命，并承担建立民国的任务。但重兵在握的袁世凯并不急于求成，他在继续观望。丁格尔采访黎元洪，直问黎，是黎还是袁会被推举为总统。黎元洪回答说，袁世凯也许会在共和派中获得高位，但袁现在只是在观望。对于袁世凯的这种观望行为，丁格尔并没有过多的评述，他只是认为袁世凯是个杰出的人才，对现状了如指掌，仅仅在等待时机。他说：“袁世凯是所有中国人中最聪明的，也许会料到这些，袖手旁观、以逸待劳也许正是他的英明之处。”（丁格尔著，刘丰祥等译：《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辛亥革命的狂飙和清政府的腐败，为袁世凯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非常好的客观条件。当革命继续蔓延开来，当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一个又一个的省区落入革命党人手中后，观望中的袁世凯已经知道时局正在发生变化。他两次写信给黎元洪，希望停止战争，进行谈判，并许诺废除清朝皇族的特权，依据宪法建立一个新政府。对于袁世凯这种见风使舵的做法，黎元洪并无反感，反而给予了友好态度，他给袁回信说，从袁以前的经历来看，袁不应只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如果袁愿意反正，将会被推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黎元洪的信号后，对革命派做出了和谈的姿势。对于袁世凯的这种转变，丁格尔似乎还没认清袁世凯的真正意图，只说袁被视为伟人，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的。谁知狡猾的袁世凯，一面知道



袁世凯



埃德温·约翰·丁格尔

清廷大势已去，转向缓和；一面又命令清军与革命军继续作战，争取主动。就在黎元洪不断劝说袁世凯加入革命党之际，丁格尔对清军和革命军的作战情况有了新的认识。他此前报道的多是革命军给清军以沉重打击的新闻。随后，他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在那段时间内，清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开始明显地展示出他们的优势。革命军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基本上是由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不懂战争的技巧，结果可想而知。”接着他分析说：“而北方军队则是由一些受过严格训练且灌输着强烈的军人意志的士兵组成……谈到中国军队编制中的缺陷，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缺陷至今也仍存在。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创建的，袁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他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

北洋军依靠自身良好的装备和纪律，取得一些战斗胜利。但此时国内的反清情绪已经高涨，袁世凯知道清廷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了。等待时机的袁世凯对

革命派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并得到了革命力量的拥护。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因此获得声望和政治资本，在革命阵营中赢得掌声。丁格尔似乎也看到这些，他在描述袁世凯改变策略时说：“当萨统制在刘家庙打了几个胜仗后，他并没有乘胜追击革命军，而是沿江退兵，他难道是在按照袁世凯的指示行事吗？后来拿下汉口，萨统制准备炮击武昌最后又结束战争，是谁在阻止他采取有效的措施呢？是袁吗？还有，11月27日汉阳被攻克，帝国士兵使武昌岌岌可危时，是谁阻止了部队的前进而使黎元洪都督有喘息之机，又重新制订了作战计划？是袁把网紧紧地撒在满清政敌身上吗？同样是他把军队撤出武昌而让革命军没费一枪一弹，就重新占领了好不容易才拿下的武昌城吗？”

在丁格尔看来，萨镇冰不乘胜追击革命军，革命军能重新夺回武昌，等等，都是袁世凯有意而为。丁格尔接着分析说，袁世凯如此做的目的



黎元洪



伍廷芳



唐绍仪

是：“他急切地希望统一国家，他也有能力那么做，同时也是为了向朝廷中腐败的人报复。”显然，这是丁格尔的溢美之词，他太不理解一个从封建古墓里爬出来的人的德性了。袁世凯对革命军纵容，对清廷逼迫，这是他看到清廷大势已去，又得到革命派许诺给的更高职权后，悄然而为的。当然，处于一线采访的丁格尔虽然知



丁格尔拍摄的革命军

道其中的一些细节，但他还是对袁世凯寄予了希望，他说：“人们都认为袁世凯在玩权术游戏……这些对他也许是不公平的。”

公平与不公平，并不能随丁格尔的喜好而论，历史也已经做了评价。玩弄权术，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通病，袁世凯之所以能轻易地获得自己满意的结果，尽揽辛亥革命的果实，玩弄权术是少不了的手段。

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权衡了自己的利益之后，袁世凯算是看清了方向，他选择了与革命派的和解。

1911年12月18日，袁世凯派出了唐绍仪、欧赓祥、许鼎霖、赵椿年、冯懿同与革命派伍廷芳博士于上海展开了和谈。唐绍仪和伍廷芳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这次和谈主要围绕“君主制”和“共和制”展开。显然，唐绍仪奉了袁世凯的命，主张君主制；而伍廷芳则主张共和制。在和谈后，受过西方教育的唐绍仪自己称：“共和立宪，我个人极表赞成。因为它是解决目前危机的惟一办法。但在今日之

和平会议上，我等必欲为满洲、蒙古、西藏与其他地区完全无缺之君主立宪，方为妥善。”并且说：“关于共和问题，我须致电袁世凯请示。”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后，袁世凯显然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君主立宪主张，并且削弱了唐绍仪的权力，声明唐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权定夺。对于这一点，对辛亥革命抱以积极态度、并希望这次革命能彻底改变中国的丁格尔对袁世凯似乎并没有批评，他只说：“正如一个中国人所指出的，他想做中国的拿破仑而不是乔治·华盛顿。但如果袁世凯真有野心……希望当皇帝，他可以利用的最有利的形势就是接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假以时日，就像拿破仑在法国所做的那样，直到不可避免的倒退开始后，蜕变成帝国就相对容易了。”袁世凯似乎被丁格尔说中了，他后来就是先接受总统的职位，再当上了皇帝。

就在袁世凯坚持自己的顽固主张的时候，孙中山的到来改变了整个形

势。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领导辛亥革命，但早在几年前，孙中山就已经成为中国最有成效的革命家，他一直是海外华人起义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回国，自然就被拥戴为新的政权的领导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新的共和政权诞生了——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由于清廷未退位，加上袁世凯把持着重兵，政权自然是不稳固的。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些，知道只有劝说袁世凯弃暗投明，才能保证共和政权的正常运行。孙中山主动邀请袁世凯来南京就任大总统职位。在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就致电袁世凯，明确表示说：“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碎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中山告诉袁世凯不要担心，待清帝退位后，他将主动辞去大总统职位，请袁世凯当大总统。袁世凯虽然有些担心，不知孙中山是否真的愿意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但他手握兵权，也不着急，他在继续玩弄着他那一贯的权术游戏，一面劝说清廷体面地下台，一面在等待时机，制造北京混乱局面，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获取革命的果实。

制造北京混乱局面是袁世凯拒绝南下的伎俩。孙中山辞职时附有三项条件，交参议院通过，其中一项就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袁世凯深知，南京乃革命的前沿，到南京必将受制于人；而北京则是自己的老巢，人际关系熟悉，可以完全控制局势。于

是，袁世凯在接过孙中山的职位后，振振有词地说，不能离开北京，离开北京，“一切变端立见”。接着，2月29日，一件经过精心策划的事件发生了，驻京部队第三镇在东城发生了兵变，袁世凯就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丁格尔只作了一些轻描淡写：“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北京又发生了一场骚乱，1912年3月，首都极为混乱……袁世凯似乎完全不能控制形势，整个国家将从袁手中失去。袁世凯其时已经宣誓就任总统，孙逸仙体面地退位了。围绕着把首都定在哪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正当袁要到南京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北京的骚乱搅乱了一切，但这只是政治上的麻烦之一。”在丁格尔的眼中，北京兵变事件与袁世凯并无关系，只是在“袁要到南京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而已。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拒绝南下后，在北京宣誓就职。丁格尔参与了其中的报道，并对新的政权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认为，“现在，中华民国正处在世界列强之中”，“在最近的六个月中，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备受关注，她已经以令人震惊的速度经历了那场伟大的民族变革”。丁格尔对中国的新生政权寄予了希望，对袁世凯寄予了希望，但遗憾的是新的政权却迷失了方向。丁格尔一定没想到，袁世凯居然还有后来的称帝运动，共和政权后来居然变成了军阀混战。

1912年4月，就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十多天后，丁格尔以最快的速度写成《China Revolution: 1911-1912》（《中

国革命记》)一书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伦敦、纽约也同时发行。《中国革命记》是关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第一本书。在此书中,丁格尔除了对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以及袁世凯领导的军队给予赞赏外,还专门列出了“袁世凯”一章,对袁世凯进行介绍。

丁格尔对袁世凯的专门叙述,是从袁世凯痛恨并力图改变晚清腐败无能窘境开始的。丁格尔说,在中国,袁世凯是四亿中国人中最深知清廷无能的人,袁世凯在汉城担任“驻扎官”的时候,就对中国的无能感触颇深,并确信大清帝国已摇摇欲坠,最终必将土崩瓦解——除非她能像日本一样吸收西方文明 and 知识。在汉城感受到的这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使袁世凯从那以后“着手改革”,并且“他的改革是如此的深入,目标是如此的明确和坚定不移,以致人们公认袁为改革者”。

丁格尔说,由于日本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和清政府对袁的冷落,袁在偏远的地方过了一段单调、清淡的日子。直到1898年,袁世凯才回到自己的职位上。在维新运动中,他获得了期待已久的

职位——掌管全国练兵事宜的兵部候补侍郎。丁格尔称赞说,在新的环境下,袁世凯获得了发迹的机会,他应付事件的能力证明了他的过人之处,“从控制为数甚少的一些经过现代化训练的兵士开始,他是执着地实践他脑中的军事思想,以致于发展中国的现代军队便是其结果”。军队建设,是袁世凯的得意之笔,也是袁世凯后来之所以能获得最好权位的条件。袁世凯的治军理念就是绝对忠诚。绝对忠诚本来是件好事,军队本来就应该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但遗憾的是,忠诚的对象被缩小了——只对袁世凯个人忠诚,以致后来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的图像在军营中到处悬挂,袁世凯也因此获得了绝对的政治资本。这些都是当时的清廷所不愿意看到的——整个国家的政权都落到了袁世凯手中;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埋下了隐患,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埋下了隐患。对



革命军中的炮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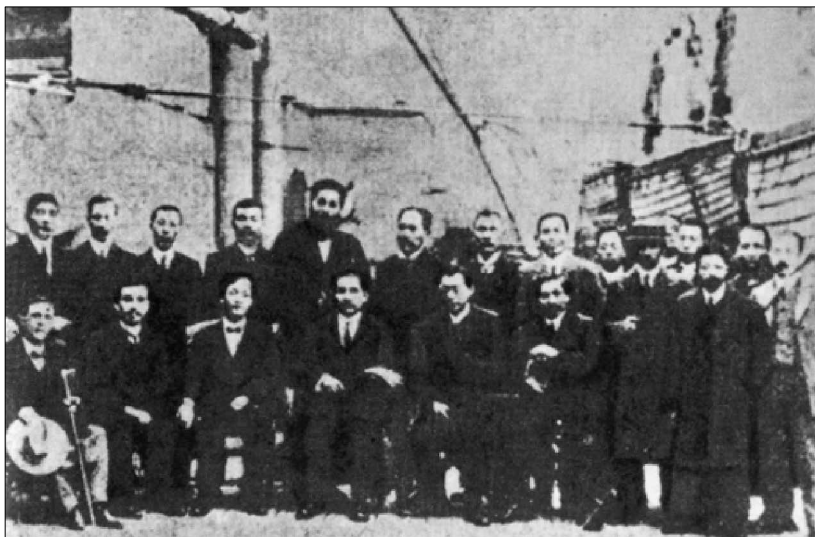
于这些，丁格尔当然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丁格尔只认为袁世凯力图改革，掌握了军队，为改革提供了保障，并乐于见到袁让中国获得前进。这或许是当时的不少外国人对中国和袁世凯的看法。当时不少外国观察家认为，袁世凯将超越李鸿章，达到新的高度。

丁格尔除了对袁世凯力图改革、掌管军队有方大加赞赏外，对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出卖维新派，使中国与君主立宪制擦肩而过，错失发展民主政治的举动并没有什么批评，甚至还进行了辩护。

丁格尔说，在维新运动中，袁世凯背叛了皇帝，给改革派以致命的一击。但在丁格尔的分析中，一面说“我们把事件的结果留给历史去评价”，一面又说“袁却是能控制形势的强力人物，他能避免整个国家一齐遭殃”。对于袁世凯出卖维新之说，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做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评价。有不少历史学家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袁世凯有出卖维新的行为。袁世凯告密出卖维新派之说，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传很普遍，这主要源于康有为之笔。康有为作为维新

改革的先锋人物，又是失败者，自然受到别人的同情，他的言说影响了当时的政界、学界。特别是关于袁世凯“告密”之说，影响甚大，包括不少对袁世凯多有称赞、与袁有密切来往的外国人也这样认为，比如袁后来的政治顾问莫理循，长期活跃在宫廷、与袁有交往的赫德兰等。但丁格尔和这些外国人一样，既默认了袁世凯告密之说，又为袁世凯告密进行辩解，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袁世凯在关键的时候做出的正确选择，并且更加相信袁世凯因此能更好地承担起领导中国前进的职责。

对于袁世凯镇压义和团运动、袒护外国人的行径，后来的历史学家多有批评，但袁世凯这一举动不仅使他获得了直隶总督的位子，更使他在外国人中的威望大大上升。丁格尔说：“鉴于他在绞杀义和拳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及拯救了很多洋人性命，他也得到了设在北京的外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上海。这是孙中山在回国途中的留影。

国大使馆里的外交官们以及整个文明世界的尊敬。”国外势力在中国受到威胁，这是大多数“外国友人”所不愿看到的，丁格尔自然也不例外。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袁世凯，可谓“明察秋毫”，他在山东任总督时，就近距离地研究了义和团，并明白了义和团的用意。当动乱爆发时，袁世凯假装只看到狂热的迷信者，并开始狠狠地打压，驱使义和团向北京挺进。义和团的爱国行为得到清政府的默许和纵容，变成了对付洋人的工具，进而有了“庚子使馆围攻”之历史事件。事实上，袁世凯在这一过程中，态度一直比较暧昧，他在等待清廷和洋人的态度以及双方力量悬殊的变化。他一面等待清廷的号令、态度，一面又设法保护洋人，以求两全其美。后来，这种政治上走钢丝的危险行为，使袁世凯获得了威望，赢得了更好的职位。可以说，当袁世凯坐上直隶总督的位子后，人们似乎就已经预测到往后中国的天下就是袁世凯的了。

此后，袁世凯的仕途并不是像想像的那么顺利，他因为慈禧太后的驾崩，失去了靠山；但两三年后，武昌起义的爆发又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袁世凯接命后，很快就掌握了主动权，他通过隆裕太后，解除了摄政王的职位，彻底掌握住了清廷的政权，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虽然在革命派和清廷之间摆来摆去，但他已经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对于这些，丁格尔和当时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对袁世凯寄予希望。丁格尔说，从袁世凯被委任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起，袁世凯的

政策即使对于从最近距离观察他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谜。他最热心的崇拜者也被他弄糊涂了。在他重返政坛以来的短短几个月中，袁世凯获得很多头衔，因为他的政策，他被称为独裁者、阴谋者、帝制自为者——中国的“伯爵”。丁格尔赞许说：“人们相信他的愿望是真诚的，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寻求国家和民众的最大利益。”

乱世出英雄，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袁世凯的确赢得了掌声和地位，成就了个人事业的顶峰。丁格尔作为一个中国通，作为一个外国驻华记者，对时局、对辛亥革命、对袁世凯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这些判断多有溢美之词，对袁世凯寄托的希望比谩骂要多，对中国辛亥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希望中国能在袁世凯的领导下，重振东方大国的魅力。这些，似乎也大体反映了当时一些外国友人对中国和对袁世凯的看法。

丁格尔对袁世凯做出称赞的时候，他并不能预测中国后来的走向，也不能预测袁世凯后来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影响丁格尔这些评价的价值。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另一历史评价的视野和角度，哪怕这视野和角度有些偏颇，但这似乎更接近于历史的本身。

曾经叱咤风云的袁世凯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远去，渐渐被我们所淡忘；丁格尔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谁能记住他呢？但历史也许就在这渐渐被遗忘的时候，才越发显得生动、真实。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